

## 连接与合作：全球高等教育研究的连接与合作

丽贝卡·申德尔、马塞洛·诺贝尔

丽贝卡·申德尔 (Rebecca Schendel)：美国波士顿学院 (Boston College) 国际高等教育中心  
执行主任

电子邮件：schendel@bc.edu

马塞洛·诺贝尔 (Marcelo Knobel)：巴西坎皮纳斯州立大学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Campinas)  
物理学教授

电子邮件：knobel@unicamp.br

鉴于全球范围内专注于高等教育的学术项目和研究中心的激增，我们很容易忘记，高等教育的学术分析实际上是一个相对较新的事业。高等教育研究社区的历史大约只有六十年，且大部分时间里，只有少数几个国家的少数研究人员参与其中。然而，随着高等教育本身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扩展，这一领域也得到了发展。如今，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国际研究社区，涵盖了既关注高等教育的地方性/国内问题的研究人员，也包括更多关注其国际层面的研究人员。这一发展充满希望。今天，关于高等教育的集体“知识”变得更加丰富，而且这些知识来自一个更加多样化的研究者群体，这些研究者遍布全球，处于不同的制度背景中。因此，这一发展为智力多样性提供了巨大的潜力，从而为应对高等教育领域的既有挑战和新挑战提供了新的视角。可以说，高等教育领域——包括国际高等教育这一子领域——已经进入了一个成熟的阶段，逐渐从其他学科的边缘走向了一个独立且成熟的学科。

### 发展成熟的领域，但影响力有限

然而，尽管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对高等教育具备了更多的“知识”，但在实际层面上，世界许多地方的高等教育依然处于危机之中。在许多背景下，公众对高等教育价值的认同正在急剧下降。在许多高等教育完全普及的教育系统中，年轻人越来越质疑获得大学学位对其未来就业前景的重要性，而一些更具民粹主义色彩的政治人物，常批评高等教育为精英机构，脱离主流社会。一些对高等教育的保守批评虽然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在全球范围也越来越普遍。研究高等教育的学者知道，许多针对高等教育的批评并没有得到实证证据的支持，但这些批评日益显著的重要性表明了整个领域未能将研究成果有效地转化为政策和实践上的影响。

### 影响的障碍

高等教育研究产出与实际影响之间缺乏对接的原因有很多。最重要的是，高等教育研究者面临多个优先事项，这限制了他们将研究转化为政策和实践的时间。那些拥有学术合同的人必须优先考虑在同行评审的期刊上发表文章，而不是从事更具影响力的实践工作，比如担任顾问角色或在主流媒体上发

表文章。那些希望从其他学科分析高等教育的人还面临额外的出版压力，因为他们不仅要自己所在领域发表文章，还要在高等教育文献中发表。许多人还承担着重要的教学和服务责任，这对高等教育的实践至关重要，但也限制了他们投入更多时间从事面向公众的工作。

激励机制也制约了新视角的发展，主要限制了该领域在全球范围内扩展潜力的实现。随着高等教育领域的变化，现有的概念和理论必须随之演变，并在广泛的背景下得到应用和检验；必要时，还应开发新的理论和概念来替代现有的理论。然而，这种情况并不常见，主要是因为现有的激励机制并不优先考虑概念性研究。那些最有可能提供新视角的研究者——特别是来自全球南方的学者（在这些地区，高等教育研究相对较新）——往往也是最缺乏时间或资源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包括新理论的开发。因为他们通常在快速普及的教育系统中承担大量教学和服务工作。

此外，减少新视角可见性的障碍也非常显著。那些使用非英语语言的学者，由于高等教育领域的主要期刊都以英语出版，他们很难接触到国际观众。尽管技术本应促进民主化，但它通常扮演着有害角色。搜索引擎中的算法会将研究者引导至被引用最多的来源，而社交媒体平台的算法则形成学术回音壁，使政策制定者和从业者更难发现和接触到他们现有网络之外的研究成果。人工智能有可能进一步加剧这种研究上的视野狭隘，限制政策制定者可以接触到的观点范围，因为大语言模型的工作基于先前发布的信息数据库。

## 合作的必要性

当代对高等教育的反弹，或许正是国际高等教育研究社区亟需的呼声。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刻都更了解高等教育——包括它的潜在好处和显著的失败——这一点具有巨大的潜力。然而，如果这些知识主要局限于学术回音壁中，且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不可见，那么这一机会就会被浪费。缺失的是联系（无论是不同背景之间，还是个体研究者之间、数据集之间，甚至是不同知识和理解方式之间）和转化（既包括语言间的翻译转化，也包括从学术话语到通俗易懂语言的转化）。挑战在于，原本可以促进联系和合作的空间，如会议、学术期刊和研究中心，往往也在延续上述许多挑战，而没有利用其权力地位来解决这些问题。

因此，组织高等教育领域聚会的研究中心和学术协会在应对当前困境时扮演着关键角色，它们可以做得更多，帮助将不同的高等教育知识体系汇聚在一起，搭建高等教育研究社区与政策、实践领域之间的桥梁。学术期刊、出版商以及其他“知识生产者”也应承担更多责任，优先考虑智力多样性，并致力于开放传播知识。治理学术工作负担的机构也应发挥作用，鼓励研究者促进内外领域之间的联系。同时，实践者和政策制定者也应积极行动，主动与来自不同地理背景的学术领域进行互动。虽然这些行动的实施具有很大的挑战性，尤其是在一些不太成熟的机构和影响力较小的背景下，但它们并非不可能，且潜在回报极为丰厚。事实上，除非我们付出巨大的努力，否则全球高等教育领域的成熟潜力将无法实现，且面临的危机将继续存在，最终对我们所有人造成不利影响。

注：本文的灵感来源于 2023 年 6 月首届波士  
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双年会（*CIHE*  
*Biennial Conference*）议闭幕环节的讨论。